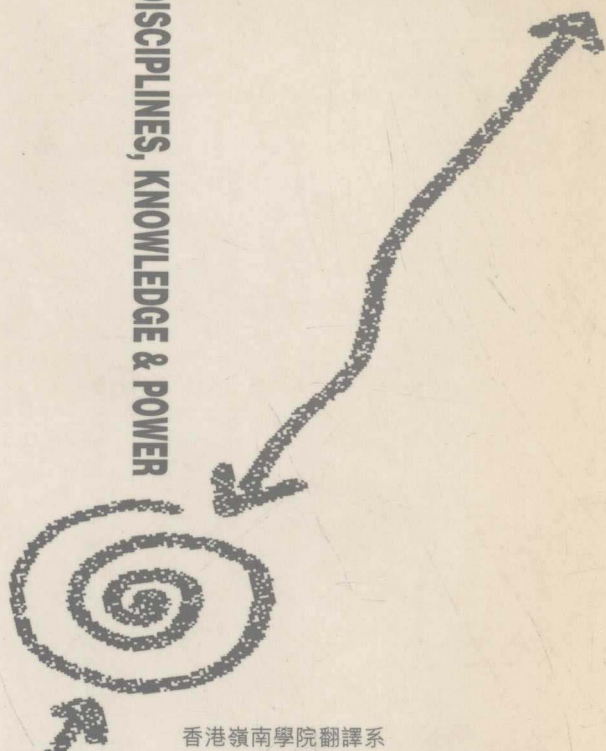


學科 • 知識 • 權力

DISCIPLINES, KNOWLEDGE & POWER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

學科規訓制度導論
教育與學科規訓的源起
會計學：一門學科規訓
管理學：一門道德技術
充當一種志業的人格
超越年鑑學派？

C53
9823

港台書室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 (一)

學科 · 知識 · 權力

編譯者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

編委成員

許寶強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劉健芝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伍志雄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羅永生 香港嶺南學院通識教育部



803910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6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學科 · 知識 · 權力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 (一)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

©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
 ISBN 0 19 587841 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文化 / 社會研究譯叢
顧問委員

Giovanni Arrigh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UNY-Binghamton, USA

Tani Barlow

Wome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Chen Kuan-Hsing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Mushakoji Kinhide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Yokohama, Japan

Muto Ichiyo

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re, Tokyo, Japan

Ashis Nandy

Directo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New Delhi, India

Suthy Prasartset

Faculty of Economic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Fernand Braudel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UNY-Binghamton, USA

譯叢總序

如果要數對中國歷史有深遠影響的翻譯大事，我們或會列舉南北朝時期的鳩摩羅什翻譯《般若經》、《法華經》等大乘典籍，明代的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以及清末的嚴復翻譯《天演論》、《原富》等等。這些翻譯工作分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出現，啟動了漢語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流，在不同程度和意義上，塑造和改變着華夏之民的世界觀。明代以來一批又一批來華的傳教士，積極翻譯《四書》、《易經》等典籍，更使歐洲產生了影響他們（以及我們）深遠的「中國觀」。這些富有遠見、影響深鉅的翻譯工作，在引介來自他方的重要思想時，尚曾引起對諸如「格義」等譯學問題的反省，可惜時至今日，對翻譯重要性的關注，似乎多局限在語法與修辭上的執拗。在英語大為普遍的香港，更有「翻譯是否需要」的質疑。

不過，正值當代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文化研究都不約而同地借取「翻譯」這概念來建構新的理論模型，以解脫各自學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困境之際，這種「翻譯無用論」似乎來得有點生硬。當代詮釋學批判及承繼了西方釋經學傳統，探討人類互相理解的可能，挑戰着實證科學的主流；解構學更進而質疑語言系統的穩定性，後殖民評論則着眼於發掘過去和現在的文化體制內藏着的權力關係；當代人類學家也徬徨於民族誌書寫對異文化的再現；傳播學關心訊息傳遞方式的轉變如何影響身份認同的建立……這些世界學術界關心的迫切課題，當然亦是漢語人文及社會研究，開展與世界學術界接觸的門檻。無獨有偶，這些問題都是與翻譯這門學問和技巧的中心題旨息息

相關，牽涉到我們如何看待文化間的對話、意義的傳遞與散播、知識和真理以甚麼現實歷史條件存在等。

位處香港這個多元文化匯聚和衝擊之地，作為各文化體系夾縫中的翻譯者，我們既不應有狂妄的態度，以掌握了英語這強勢的學術語言而自詡為中心，亦不應奢言能向國人轉售現成西方學術殿堂內的瑰寶或時尚，而是應以自省的態度，嚴謹的翻譯踐行，促成文化思想的交流、知識的擴充和對自身的反省。我們最高的期望不是為「拿來主義」者提供捷徑，而是透過引介在不同的學科或存活領域的思想和研究果實，爬梳因身處文化和思想夾縫而有的困惑，面對由此引起的焦慮。人類學家 Crapanzano 曾經以希臘神話人物 Hermes* 的處境來解釋這種焦慮：

〔希臘神話人物〕Hermes 既是一個傳訊者，也是一個玩詭計的人。他夾在發訊者與收訊者中間，知道只有在被人聆聽的時候才有力量，所以惟有以各種修辭技巧去干擾和打破收訊人的偏見和既有認識，以搏取注意。吊詭的是，傳訊人首先要製造疑慮，然後又要打破這些疑慮，但卻不能連疑慮所引起的焦灼和關懷都打破，因為沒有這種焦灼和關懷，傳訊者的訊息便沒有人會細意聆聽。

翻譯者的確具備這種在夾縫中方有的力量，不過也同時永遠背負着這種兩難的焦慮。但我們以為，這種焦慮同樣是所有身處巨變世局當中有責任感的學人共有的焦慮。因為從某個意義來說，無論我們從事甚麼學科，進行那一種研究，我們都只是跨文化的知識與學術體制中的「翻譯者」。與鳩摩羅什、利瑪竇和嚴復等不同的只是，我們彼此活在不同的歷史。我們各自有不一樣的使命、制肘，也有各自不同的時代狂妄，以至需

*Hermes 亦正是詮釋學（Hermeneutics）一詞的字源。

要反覆地用不同的修辭（或詭計）去說明、破解，或再演繹出翻譯的重要性。而我們存活着的，更是一個我們既要自省和批判翻譯的前設和局限，又要自覺到翻譯的責任和可能性的歷史。

本系列的選譯範圍遍及當代文化和社會研究當中最受注意的課題和前沿性的研究方向，以跨科際、具反思性、具批判性為特色。這種寓介於譯，評譯並重的選題，既內含填補漢語文化和社會研究某些空白的衝動，也提供機會讓我們以親身的踐行，去反省、整理、批判與這些研究相關的翻譯問題，以至更廣泛的去檢討當代漢語的語境如何消化、回應這些以英語為媒介的思想成果。能夠開拓多層次的討論議題，就是我們的最高期望。自覺到翻譯人的局限，背負着上面所說的焦慮，我們的選題未敢奢言能夠掀起一代學風，各專題的選文亦只是選者在具體歷史視角制約下的產物，裡面內藏着的錯誤理解亦期待着讀者開放的對話和批評來糾正。但我們期待這種種努力能夠做到的，不單是「譯」出美文，充當文化譯使，而是藉此略盡知識人的綿力，稍稍「翻」動一下這個既有認識、偏見、迷障，甚至詭計等，都比過去更為隱晦，但內藏着的焦慮不安卻無處不在的歷史。

創刊號代序

嶺南學院翻譯系同仁，羣策羣力，創辦了這本《文化/社會研究譯叢》（下作《譯叢》），由於坊間並無類同刊物，可說開風氣之先。意義亦不尋常。且引「總序」一段話：

本系列的選譯範圍遍及當代文化和社會研究當中最受注意的課題和前沿性的研究方向，以跨科際、具反思性、具批判性為特色。這種寓介於譯，評譯並重的選題，既內含填補漢語文化和社會研究某些空白的衝動，也提供機會讓我們以親身的踐行，去反省、整理、批判與這些研究相關的翻譯問題，以至更廣泛的去檢討當代漢語的語境如何消化、回應這些以英語為媒介的思想成果。能夠開拓多層次的討論議題，就是我們的最高期望。

上面引文，我們不妨就「寓介於譯」這範圍稍作引伸。首先，我們得坦承這一事實：無論在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文化研究的科目上，為了不與時代脫節，我們不得不借重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

站在所謂「學院派」的立場看，要從事嚴肅的學術研究，要看的、或要引用的材料，合該是原文，否則便失去「權威性」。但理想與現實往往不能一致。今人讀荷馬史詩，能直接引古希臘原文的有幾人？

此譯叢編輯宗旨明確：寓介於譯，「既內含填補漢語文化和社會研究某些空白的衝動，也提供機會讓我們以親身的踐行，去反省、整理、批判與這些研究相關的翻譯問題……」。所謂「空白」，我想該是一些在西方學界已成「時尚」、但對國人來說仍屬一知半解的觀念或意識形態。

我們隨便舉些今天常在學報看到的名詞，如 Postcolonialism, Orientalism 或 Occidentalism。要找這些詞語的中譯，翻翻字典就成了。但「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這些別開生面的詞兒，其內涵與構思，是否也一樣「別開生面」？

能夠直接參考像英、法、德等原文文獻的讀者，會自己找出答案。但我們從總序的文字可以看出，《譯叢》這本刊物的讀者對象，不是「孤芳自賞」的象牙塔專家，而是關心世界學術思想動態的「有心人」。這裡所說的「有心人」，不外是書生。書生雖然不能事事關心，但最少心中存着對家國興亡那份憂患意識，不敢後人。

嚴復當年自英倫歸國，請纓無路，奮而為翻譯，常為一詞之立，整日躊躇。語言的份量，在名家筆下，有時確似石破天驚。別的不談，單提衍生自《天演論》學說而來的「物競天擇」這四字真言，就迫使我們對天人感應、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等種種習慣性的假定，不得不一一就此修正。

《譯叢》創刊號的目錄，就題目而言，有兩個最少在我看來是相當別開生面的：Stephen J. Ball 的 Management as Moral Technology 和 Ian Hunter 的 Personality as a Vocation。

管理學怎麼會是一種「道德技術」呢？同樣，人格就是人格，怎會與「志業」拉上關係？這些拚湊，未看全文，或許會覺得不倫不類。我想當年基督教信徒初聞人類祖先是猴子「進化」而來的，也有類似的陌生感吧。

由此可知「一詞之立」工作之吃重，因為引進一個新名詞、新術語，不能不同時介紹與這名詞術語相關的和理論。Management as Moral Technology 和 Personality as a Vocation 這些觀念和主張，介紹到中文世界來，會否「關乎宏旨」？會

專題導論：從學科改革到知識的政治

不會收立竿見影之效？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負責籌備、策劃、執行出版這刊物的這一羣嶺南翻譯系男女書生，已盡了心力。求學做人，盡心而已。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

劉紹銘識於香港嶺南學院

鳴謝

本叢書從籌劃至踐行，經歷數番波折，能夠成功面世，實有賴下列人士不斷的鼓勵和無私的協助。嶺南學院文學院院長、前翻譯系系主任劉紹銘教授，對本計劃大力支持和關懷，並在百忙中抽空為本叢書創刊作序，我們至感鼓舞；現任翻譯系系主任黃國彬教授，為叢書中部分法文中譯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對上述兩位扶掖後進的熱忱，我們致以由衷感謝。另外，翻譯系老師黃燕堃、張南峯、莊柔玉、許兆麟、黃靜文、黃德興以及研究生蘇耀昌、莫淑儀、畢業生薛翠、張嘉莉、張馨文等，均對本譯叢提供了各種寶貴建議和幫助，在此一併致謝。我們更要多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所提供的編輯建議和專業編務協助，以及文學院和翻譯系同事黃德賢、陳彩雲、蘇佩珊的技術支援。最後，本叢書得以如期出版，亦要多謝嶺南學院教學發展基金（Teaching Development Grant）的資助以及各論文作者和出版者慷慨允讓翻譯版權。經驗有限，錯漏在所難免，不用說當然是編委會的責任。

專題導論

從學科改革到知識的政治

過去數個世紀以來，人類對自然界和自身的生存環境的認識，取得了飛躍的發展，有人以「知識爆炸」來描述這種變化。但與此同時，知識急劇的發展，知識範圍的迅速擴大，除了增加了人類主宰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之外，也同時帶來不少前所未見的問題。生態的破壞、戰爭的威脅、社會秩序的急劇轉變、人們思想和意識上的不安，在在都顯示知識的增長並非一個可以無限膨脹的氣球。在各種可能出現，而不少正在日益惡化的問題未至不可收拾之前，擺在人類面前的挑戰，便是如何令知識的增長能真正為人類的長遠利益和福祉服務，如何令追求和發展知識的活動，可以同時發展出足夠的自我反省能力。

不過此等以人文精神為主導的理想，面對現代世界各種越來越複雜而龐大的學術體制，似乎有點無能為力，原因是現今的學術知識生產，已深深地和各種社會權力、利益體制相互交纏。這不單只是說大規模的知識生產只是為功利的社會國家目標甚或個別社會階層的利益而服務，而是說學術體制的內部組織，關於知識發展和開拓的規劃，都受制於關乎學科門類的偏見，及這些偏見所體現出來的權力和利益關係。偏狹的學科分類，一方面框限着知識朝向專精化和日益互相分割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這些學科訓練的人，日益以學科內部的嚴格訓練為藉口，樹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謀求鞏固學科的專業地位。學科制度的優點是能夠建立完整而融貫的理論傳統和嚴格的方法學訓練，但亦有危險使學術體制成為偏見的生產地，以服務自己的利益（self-serving）為尚，建立虛假的權威。

針對這種情況，不少學者進行過理論和實證的分析。過去數十年來亦有不少新的嘗試和改革方案付諸實行，例如各門新興的跨學科如地區研究等，成績亦見參差。為了探索當代學科分隔背後更深廣的歷史原因，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為首的一羣科學家 and 社會科學家，今年以多種語言出版了一份題為《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下簡稱《開放社會科學》，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中文版）的研究報告，號召社會科學工作建立一種更開放和更「紮實可靠的知識」（valid knowledge）。

他們指出，當前在社會科學領域主導着的學科分割，起始自十九世紀，將社會研究劃分為歷史、政治、經濟、社會、人類學等互相分割的學科。這套學科劃分準則內含着對掌權者有利的理論前提和意識形態，包括歐洲中心主義、父權主義、科學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等，它們一一被建構出來的期間，國家政權的力量一直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國家一方面促成大學的復興，使大學成為生產知識的主要場域，又引導大學的學科知識往實用的政策導向研究。其結果是令得以牛頓力學為模型的科學主義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這種強調探求事物普遍規律的學問法則，使精確度和實證性成為量度一切知識的標尺。

這種發源於英、法、德、意和美國的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學科知識範式，是與歐美勢力在世界擴張的同時發展起來的。特別是在戰後初期美國霸權宰制和世界經濟急促增長之下，這種帶歐洲中心視點的社會科學學科範式更大規模地在世界各地擴散，成為欠發達國家的學術體制正統模式。然而，隨着歐美霸權的日漸衰落和世界各地非殖民化運動的發展，各種反歐洲中心/父權中心的努力提出了多種在知識領域的非殖民化要求。這種要求除了在政治上要求改組和擴大學術殿堂的構成和人選之

外，在知識論上亦對主流的社會科學知識劃分作出挑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學等的重新溶合，「新科學」和文化研究的發展，衝擊着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對立，挑戰着規律科學和描述特性的學問之間的分野，人與自然之間的本體論區分也被動搖。在這些新趨勢之下，《開放社會科學》作出了重建一種更紮實可靠知識的號召。

不過，應該重建什麼樣的社會科學呢？《開放社會科學》提出打破人與自然之間的本體論區分，不再以國家為分析社會行動時理所當然的分析單位，提倡一種「多元普遍主義」，建構一種新的客觀性觀念。這幾項主張既要面對和梳解追求規律知識和理解特殊現象的張力，也要在批判絕對中立知識這錯誤前提的同時，拒絕把知識零碎化。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開放社會科學》提出了一些彈性地跨學科的制度改革建議，例如跨學科的研究計劃，強制性的跨學系聯合聘用制度，跨學系的研究生培訓等，作為一個根本性的改革綱領，踏出把社會科學開放出來的第一步。

作為一份討論綱領，《開放社會科學》誠然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議題。而雖然它在分析這套社會科學框框的歷史建構過程，並沒有忽略權力的向度，但它仍然主要集中在世界政治經濟脈絡層面上的宏觀分析，從歷史處境對知識生產的外緣性影響出發，缺乏了從微觀層次上，探索這些知識和它們的生產方式，如何在形塑着其研究對象的同時，也在構築着創造這些歷史的不同主體，以及這些知識是如何與各種其他層面的技術配置互相模塑。由於忽略了這個層面的分析，所以華勒斯坦等人對學科知識和權力機制的關係的分析，並未能擊中要害，其改革方案雖然是主張對知識的生產條件要有歷史意覺，但其建議最後亦只是緊緊的依從着科學主義所要求的知識論條件來提

出。這種分析和改革建議的盲點，正是忽略了對discipline這一概念除了學科之外的另一重意義，也就是傅柯（M. Foucault）所指的規訓方式的了解。

這個專輯的幾篇選文，便是從discipline同時作為學科和規訓方式這個角度出發，探討「知識—權力」體制的構成，以便讀者能作出對照。這專輯的第一篇文章《學科規訓性導論》從discipline的字源追溯其代表知識和權力的兩種含義，追溯了學科規訓制度生成的歷史，指出了各種學術組織和大專學院如何依據一些排他性的方式，與其他機構合組成各種學術社羣，掌握着各種資源和權力，左右學科發展的方向。作者的分析背後所隱含的立場，是將學科知識不單視為純粹的知識論層面的事，而是一種社會實踐。但跟其他過去的知識生產方式比較，學科規訓制度是一種高度制度化的形式。在這種層級界限森嚴的運作前提下，學科規訓制度其實是社會控制和軌調（regulate）方式的一部份。而所謂跨科際規訓制度，雖云是要彌補缺陷，打破僵化的學科界限，但由於往往沒有碰及知識生產組織結構的根本，所以仍然會排擠掉各種變革的力量。作者特別以女性主義的新知識形式為例，說明學科規訓制度可以將女性主義等各種新型知識吸納，但仍將女性主義等所提倡的改造社會關係事業拒諸門外。

《教育與學術規訓源起：意想不到的逆轉》（下簡稱《教育》）和《會計學：一門學科規訓——被忽略的補充》（下簡稱《會計學》）兩文，一方面批判傅柯的局限，另一方面也進一步發展了傅柯的觀點。《教育》一文指出雖然教育學往往被視為一門次學科，似乎比其他學科缺乏地位，但從系譜學的追溯可以看到，所謂新的知識門類的出現，其實是新的教育實踐形式所帶來。十八世紀後出現三種新的教育技術——考試、評

分和書寫——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方法和教育者與學生的關係。這些微細的教育實踐方式改革，對整個近代學科規訓制度的生成起着無與倫比的影響。它們使教學雙方都要面對經常性的監視和評斷，因而慢慢地懂得作出自我規訓，對自身的身體以及思想作出經常的檢查、評核和計量，不斷衍生出一種會對自我進行檢查審視的主體，而這種主體形式，正是現代社會權力關係的基石。

《會計學》一文則從會計學分析學科規訓制度的源起。文章的出發點是將學科知識的問題，從狹義的學院範圍擴闊到廣義的現代學科規訓世界，論證會計學並不是人們往往認為的從屬學科。會計的存在由來已久，但只是到了近代，會計才被轉化為一種將人和各種社會事物變成可審計對象的制度。而透過與種種新的教育實踐方式的結合，並通過軍事學院的規訓，會計學被轉化為可應用於大企業的管理。會計和其他可將事物變成可審計的各種制度，現在已滲透入各類公共及私人機構，所以它不僅是經濟學的一種輔助性補充，而是一種像德里達（J. Derrida）所說的「添補」（supplement）權力，構成為現代學科規訓制度的柱石。作者這種系譜學的追溯，扭轉了學科規訓制度內一種以複雜理論為優先的偏見，作者突出了會計作為一種微觀、實在的社會實踐，起着統領而非從屬的實質作用，構成現代世界和社會生活、經濟活動的形式。雖然作者未有直接談論改革的方法和方向，但對照着華勒斯坦在上述《開放社會科學》一書的主張，我們大可看出其旨趣的差異。

《管理學：一種道德技術》一文指出現代主宰學校運作的管理主義，可以充當傅柯所說的「道德技術」（moral technology）和權力技術的最佳例子。管理主義的辦學方式把層級監視、齊常化評斷（normalizing judgement）和對自我的審查

等制度等引用到學校日常運作之上，不單學習者受制於管理學的規訓，教研工作者和學校本身亦被化為「一堆可以被描述、計算、並能互相比較的數據」，受到無形的規訓權力的監控和宰制，而這些監控同時是以管理學和教育行政的學科知識出現。管理和行政成為教育的骨幹，一方面是人文心理學和系統理論等學科主導的結果，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這套以管理為中心的論述，是增強了管理人員而非教育工作者的權力。但管理人員之所以具有這種權力，反過來又是學科規訓制度下，被管理者給機制、程序和各種技巧所臣服，不斷被客體化的結果。所以，教育領域內管理人員擁有的權力，是一種學科規訓性的微觀權力，教育和學科改革的議題不可能迴避這個面向。

上面幾篇文章，從教育形式、會計和教育管理的角度，不約而同地帶出純知識層面之外的社會制度及實踐方式面向，從而討論學科規訓制度的問題。或者一些讀者會認為，這些仔細的歷史系譜學追溯，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重覆着一種人文主義的批判精神，抗議和哀嘆規訓世界對人的主體性的控制和卡壓，希望從科技文明的宰制下發出人文精神的拯救呼籲。不過，《充當一種志業的人格：人文學科的政治理性》（下簡稱《人格》）一文的作者亨特（I. Hunter），則嘗試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以歷史上人格形成方式的轉變來檢討學科知識的規訓性質和人文主義批判的局限。本文作者強調，把社會主體納入為規訓控制的範圍，是一個獨特的歷史現象。社會學家韋伯（M. Weber）曾以脫魅（disenchantment）的概念來捕捉這種理性宰制的歷史進程。然而，作者認為韋伯的分析，仍走不出將人文精神和功利實用的知識對立起來的死胡同，從而誤導了對學科所負載的權力性質的批判。

《人格》一文首先指出，把人文學科（或自由民教育/完人